

謙卑的奮鬥

何俊仁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0

ISBN 978-988-8028-88-7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http://www.hkupress.org>

盈豐國際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目錄

前言	vii
----------	-----

第一章

個人成長篇

1. 一個小渾渾	3
2. 結義桃園	5
3. 自由大學	8
4. 人格孕育	10
5. 學運開展	12
6. 一片紅色	15
7. 抗衡國粹	18
8. 起動成功	22
9. 臨陣磨槍	25
10. 連接社運	28
11. 法律專業	30
12. 尷尬初現	34
13. 誰針對誰	38
14. 難忘個案	40

第二章

政治生涯篇

15. 人心紊亂	69
16. 初試啼聲	71
17. 統戰對象	73
18. 投身政治	78
19. 政制風雲	81
20. 屢敗屢戰	88
21. 紮根地區	92
22. 創立民主黨	96
23. 競爭和整合	99
24. 重要理念	103
25. 薪火相傳	105
26. 五區總辭	109

第三章

八九民運篇

27. 難忘國殤	119
28. 萬眾一心	120
29. 營救李卓人	124
30. 槍聲連綿	126
31. 投奔自由	128
32. 移民潮起	131
33. 安頓家人	132
34. 誓爭平反	134

第四章

社會運動篇

- 35. 保釣第二波 139
- 36. 主權宣示 141
- 37. 激戰連場 144
- 38. 險葬大海 148
- 39. 釣號沉沒 150
- 40. 向日索償運動（一） 152
- 41. 向日索償運動（二） 155
- 42. 從維權運動說起 160
- 43. 維權絕食 162
- 44. 維權律師關注組 164

第五章

總結篇

- 45. 從大歷史格局看香港 169
- 46. 訪談錄 174

附錄

1. 我們對基本法的一些看法..... **194**
2. 李登輝媚日 唐家璇誤國..... **208**
3. Keynote Speech in the International Citizen's Forum
on War Crime and Redress, Tokyo December 1999
..... **213**
4. 2000年1月12日就立法會動議「向日索償」議案的
陳詞 **218**
5. 悼念杜學魁 **223**
6. Reasons to Oppose War against Iraq, Legislative
Council 19 March 2003..... **225**
7. 日本未完成的戰後責任：記憶、責任和未來 **230**
8. 我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235**
9. 支持立法會議員曾鈺成在立法會上動議「反對台灣獨
立」議案的發言，2005年10月 **238**
10. 悼袁竹林婆婆 **240**
11. 十年回歸中難忘的幾件事——一次襲擊、三次絕食
..... **245**
12. 在立法會有關「六四」的演說..... **254**

1

一個小渾渾

往事並非如煙，五十年前的很多精彩片段仍歷歷在目。我並非來自富貴家庭，但目睹父親憑個人的努力自學和奮鬥，爬上社會階梯，晉身中上管理階層。上一代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香港成功故事，作為子女的我看著父親的一步一履，得益不少。

我1951年出生，跟大部份同輩香港人一樣，住在一屋多戶的唐樓。父親何雲聰更須獨力支撐一家八口的生計，高峰期，要一日做四份工：早上到麗的呼聲（現為亞洲電視）做撰稿員，放工後去一間貿易公司處理英文書信，之後再到西環一間夜校教英文，回家後又要為外語電影做中文字幕翻譯。父親的辛勞令一家可以過著頗舒適的生活。

白手興家的父親從不自怨自艾，埋怨抗日戰爭使他被迫高中輟學，由高材生變成打工仔。相反，他繼續努力自修，讀書學英文。打仗時，他應邀替國民黨軍中的美軍做翻譯，之後，更成為一名外籍人士的「槍手」，代寫一本供學生用的標準英文範例讀物。

六十年代，父親轉往一間美資輪船公司工作。雖然他當時已四十多歲，但毫不計較由低做起，拾級而上，終於獲擢升為華人部的總經理。自此，本來植根北角的家便搬往九龍塘一所名廈。

我自幼未體驗過飢腸轆轆的苦況，父親每每給我們六兄弟妹（最年幼的妹妹與我相距十五年）零用錢，但若在街上遇到乞丐，我便很自然的把手往衣袋裡掏，把僅有的零用錢揮手饋贈。當然，同學會笑我傻，又或眼巴巴的看著同學一口一口吃零食，自己的口水不由自主的往肚裡鑽，可是心底卻感溫暖。

但我也是一個小渾渾。就讀北角清華街的聖猶達小學，上堂經常魂遊，落堂就精神過人，打架、整蠱同學、偷東西、講大話等等頑劣行為，無一不作。當時北角和富道對開停泊的貨車卡，或賽西湖水塘旁的引水道，更是我跟兄弟及同學們玩捉迷藏或游水的好去處。當然，母親知道後會斥責數句，但是年稚的我只把它當作耳邊風，過後繼續玩個痛快。

當年愛看的讀物，絕不是課本，而是充滿傳奇色彩的《神犬》、《神筆》及抗日英雄故事《財叔》漫畫書，後來更迷上了《精忠岳傳》、《水滸傳》、《太平天國》和《三國演義》這些歷史演義（開始時讀漫畫和簡易本）。它們更成為我讀中學時，經常講給同學們聽的故事。如今細味，原來這些書隱藏的影響力，傳遞的忠肝義膽、行俠仗義以至愛國為民等等的理念，不經不覺間已栽植心坎。

但由於上堂經常魂遊，放學後遊蕩街頭，無心溫習課本，成績便連考「小學升中試」的資格也沒有。最後，終獲蘇浙公學勉強取錄，一級有八班，首五班（即A至E班）是品學較佳的學生，其餘三班（即F至H班）用作收納未得派位的小六畢業生，我的成績只能配讀G班，這些「特殊班」的水平和學風，一想便知。但是，我仍未省悟，繼續胡混度日。（在此，我仍要感謝蘇浙公學給我有容身之校，否則真可能要失學而流浪街頭了。）

父親感到事態不妙，想盡辦法給我轉校。當時九龍塘有一所新落成的中學——聖公會何明華會督銀禧紀念中學，創辦人黃徐月霞是一位極有魄力、致力教育、管教有方的校長。父親早已安排我的長兄就讀，然後再努力託友人安排介紹，最終成功把我轉校，為我帶來了決定性的改變。環境的改變，不但令我邁向新的求學歷程，更令我在新環境中結識了一班桃園結義的良朋好友。

2

結義桃園

銀禧中學是一所新校，我入讀時剛是創校的第六周年。校長黃徐月霞要求嚴謹，對教育全情投入，令學校的每名老師都十分認真對待自己的教學工作。

新學校、新環境，令我培養了對求學的興趣。從渾沌中我彷彿逐漸覺醒了。我開始有一個意識，就是要努力一點，要有自己的尊嚴，不要經常被同學嘲笑和玩弄了（因為我個子矮小，成績不好，又頑皮好玩，故經常被人整蠱）。中三時，有一個中午，母親在天台曬棉被，要我看守，我帶了一本生物學教科書來閱讀。雖是首次讀那課本，但在安靜環境下，我竟一口氣讀了十數章關於人類生理學的課文，而且十分通透，甚感趣味。我對讀書，自此好像開了竅，興趣大增：明白只要用心認真細讀，都能明瞭。中三下學期考試，我的名次由以往三十名以外，一躍至十名內；其後的會考成績亦見理想，並成功在銀禧留讀預科。這年間，我認識了一群來自本校及母校對面英華中學的預科生，大家老友得如三國演義中「桃園結義」的兄弟，一起讀書、一起消閒，當中包括現時律師行的創辦人，亦是我的知己好友和表兄韋家祥律師。

在這氛圍下，我讀書由「水過鴨背」變成漸漸懂得尋根究柢，由經常魂遊而變得定性。在眾多科目中，我特別鍾愛中文，因為兩名老師講解詩詞歌賦的能力尤為超卓，令學生們進入箇中境界，所以當年的我特別耗費心神背誦詩詞歌賦。現在仍可背唸過百首詩詞。此外，教科書中選錄的論孟、老莊、經典古文、唐詩宋詞以至白話文運動後的新文學如魯迅、冰心、朱自清、聞一多、郁達夫的

著作等，也是我喜愛的讀物。《論語》迄今更一直放在我的床邊，不時翻閱。雖然我接受及欣賞西方的民主及科學精神，但亦十分嚮往尊崇儒家和道家（後來亦加入了佛家）的人生智慧。我深感這是人類社會最珍貴的文化遺產。在不知不覺中，傳統文化的思想和價值觀，孕育了我的思想及性格。

由於遇上用心教學的老師，加上志趣相投的同學，我開始在學校搞一些活動，如創立棋藝會等；另外，更經常成為同學們的「講故佬」，講述我最喜歡的歷史故事《三國演義》。我欣賞的是正氣磅礴的英雄智者或豪俠義士，為他們的忠肝義膽而感動流淚。我從不欣賞，甚至厭惡和摒棄類似毛澤東式的「厚面黑心」的權術謀略者。父親知道我性格梗直，從來認為我不宜從政。父親認為，誠實的人從政易被他人傷害或暗算，只有權謀才可生存和發揮，但我卻認為由於多數人均有此犬儒（cynical）想法，才會做成「對應預言」（好人都不從政了）。就我而言，不論做甚麼事尤其是大事者，必先立定志向，鎖定目標，繼而知道要恪守的原則，然後全力以赴，成或敗亦坦然接受，而求權與位，只是成事的手段過程而非終極所求。

「桃園」中有一名來自英華中學的李健國，個子跟我差不多，但身手矯健，在校學習柔道表現異常出色，早有師父風範，一群兄弟遂二話不說要他開班授徒。由於他領受過學校的種種規條，故眾兄弟決意自組柔道館。於是，大家省吃儉用，午餐只吃麵包或腸粉，以省下來的錢購買柔道蓆及其他用品，再借用同學家的天台做「柔道場」。未幾，「柔道場」便成為少年武術群英會的地點，什麼空手道、洪拳、詠春、虎鶴雙形等等，均可以透過交流自學。

我學習武術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要克服自己個子矮小的自卑。記得少年時跟同學們在外玩耍時，總被「大牛龜」唬嚇迫走我們，於是希望習武後不會常被人欺負。殊不知習武後未試過動手，只是



油然滲出一種定力，不會為眼前的惡人所輕易懾服。習武鍛鍊了我的意志、勇氣及自律，這些都是始料未及的裨益，使我終生受惠。從政後，我更常以陸游的名句「切勿輕書生，上馬能擊賊」自稱。

入大學後，我有幸跟隨親友向本地武術宗師朱頌民老先生學習少林詠春拳。但不及一年，朱老仙遊，我與一群朋友轉而求學於朱老的愛徒伍慶霖老師（他是一位全職教師）。伍師父除深得詠春拳的精髓外，亦多年勤習吳家太極拳，並把兩派武術的精華融於一爐，對我們這批崇尚習武的「文弱書生」實是十分吸引。

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我們一群習武的好友借用了位於銅鑼灣大坑一幢唐樓的天台，每周齊集練武，伍師父便成為我們眾人的導師。伍慶霖先生雖武藝精湛，卻又是一位溫文有禮，平易近人的學者，對佛學甚有研究。隨伍師父習武十多年，我除武術得益，在佛學的哲理上亦得到極大啟發。能夠遇得此位良師益友，實我人生之一大幸。到了八十年代中，由於我漸漸投入政治和社會運動，便不能不捨棄定期聚會習武的機會了。

3

自由大學

文化大革命對國家、人民及歷史文化帶來的災難，相信較我年長或親歷其境的同胞，迄今仍有切膚之痛或苦不堪言的感受。香港出生的我，雖未嚐箇中苦難，但從當時原子粒收音機的電台廣播，知道國內大批人民飢寒交迫，以致千里迢迢逃亡到港。報章上展示東江水上數不清五花大綁的浮屍；香港相繼出現罷市、示威，以及土製炸彈禍及同胞的慘劇；澳門軍警鎮壓示威群眾造成傷亡……等。主持電台節目《欲罷不能》的廣播員林彬，竟遭極左派人士以火水活活燒死！這一切一切，在六十年代發生，給我帶來的全是疑問，但無人給我解答。

暴力鬥爭帶來的禍害，曾經歷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父親，最明白不過，但是苦痛愈深，愈不願重提。造成此等苦難的原因，我只能等待時機發問。1969年，我升讀中六不久，從表姐韋惠英（韋家祥律師的姊姊）得知「自由大學」，便不假思索隨她而去，更拉了數名「桃園結義」的兄弟一起參加。

「自由大學」並不是正式大學，實際是所「私塾」。創辦人許冠三先生當時在浸會大學教學，後來轉至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亦是《人物與思想》雜誌創辦人和總編輯。許先生每周用一個晚上在自己的住所免費授課，概述中國現代史，範圍由清末的洋務、維新憲政運動，以至民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及以後自中共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等，在授課中闡述馬列主義的經濟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剖析毛澤東的思想、軍事及戰略思維。我對他講授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及歷史哲學等也甚感興趣。此外，他亦邀請了不少知名的學



者和作家如徐復觀、司馬長風、劉述先及金耀基等等，到其家演講授課。

當時，我們一班學員不太熟諳普通話，但是，許先生遷就我們，刻意慢慢講解，好讓我們把他所講的全部筆錄下來；另外，更安排他的太太教我們學普通話。學員中大部分是大學生，加上我們一班預科生，大家都嚴肅、認真地討論每個問題，以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發展，及文化大革命產生的始末等。

在「自由大學」數年的光景，我學得豐富的知識，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啓蒙，漸而形成和確立我的價值取向和人生理想。我不獨更紮實地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及歷史背景，更重要的是，明白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面對知識、社會及自己個人所應有的態度。

許冠三老師指出，讀書時不求甚解，把課本提供的知識不加思考便當作真理，是不可取的。許老師追求知識的熱忱及嚴謹的態度令我異常欽佩：簡單如中國共產黨建黨日（即在1921年於上海召開的中共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否7月1日的問題，他也不放過。他根據零碎的資料及當時的局勢，推論建黨日應是7月下旬。他指導學生鄧文光先生深入考證、研究，最後推論中共的「一大」並非在1921年7月1日（官方定）舉行，而是在7月22日。十多年後，一份內地研究歷史的刊物刊載一篇文章，亦指共產黨建黨日應是7月22日。

有多少人熱愛純知識？追求實用知識的人，我相信比比皆是，可是，沒有一顆熱愛純知識的心，便難以創建抽象的理論，實用的學問便難有突破發展。我想，在追求知識的同時，除了要有不斷批判和探索的科學精神外，亦要有一顆關懷社會和熱愛生命的心，以及「學以致用」的態度。自由大學的學習奠定了我畢生追求客觀知識、尋求生命意義的熱忱和情懷。

4

人格孕育

許冠三先生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教我敬服的，除了對知識追求的嚴肅態度外，還有他們的風骨和人格。由古至今，大部分人追求知識大都不離兩個目的：一是把知識當作工具，重於實用，或賴以為生；另一種是把知識作為升官上位的扶手柄，古語有云「學而優則仕」也。飽學的知識分子，不為權位所動搖，不受厚祿所降伏，仍撐著腰板，以無畏無懼的心靈，承擔社會責任，批判權貴，尤見難能可貴。

記得許冠三先生曾說，讀書人貴乎誠實和有良知，倘要委曲求全，泯滅良知以迎合時勢，是可悲的！不過，要做一個誠誠實實的讀書人，他一定要有能力承受孤獨，抵受壓力。

我最近閱讀一本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書是Posner的*Public Intellectuals*，作者在文中慨嘆此類人士愈來愈變成稀有動物，我也頗有同感，知識分子不是被政府機關吸納，就是因為功利化的社會而變質。我希望知識分子不要以為此名銜代表一種職業或是階級，而明白它代表一種社會功能。

許冠三老師終身致力於歷史研究，且不忘記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多年來（尤其在1966-70年間），在中國政治鬥爭的夾縫中，他以知識分子的真誠、勇氣和歷史學者的真知灼見，在《人物與思想》月刊中定期發表論文，如實地、系統地分析和闡釋了劉少奇和毛澤東思想和路線的分歧。他更毫無保留地披露了毛澤東及四人幫的專制惡行，以及批判當時一些趨炎附勢、向當權者獻媚的學者。

「自由大學」鞏固了我對中國現代史的認識，更啟發了我對社會人文學科以及哲學的興趣。在多名學者的輔導及介紹下，我開始



閱讀了大量中西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書籍，當中對我影響深遠的，包括代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的海耶克（Federick Hayek）、波柏（Karl Popper），人文主義者如卡謬（Albert Camus）、弗洛姆（Erich Fromm）、史懷特（Albert Switzer）等；中國近代哲學思想方面則有殷海光、牟宗三、徐復觀、張佛泉等的著作。

就讀預科期間，因為視野開濶了，原本欲跟從兄長考讀醫科的心動搖了，改為有志修讀社會科學或哲學。但是，一直堅信「專業方是實學」的父親豈會接受？兩父子遂為此數度爭拗，父親不斷以國共內鬥為例，以示政治黑暗，不宜染指。年少氣盛的我受著魯迅的影響，當下回應謂：「大丈夫求一己之安，易如反掌。醫科能救一些有病的人，但是，當年輕力壯的人因戰爭或鬥爭而死，病的不是人，而是社會，是社會有病。」結果，被父親罵我大言不慚！不過，跟父親爭拗還算小事，我曾一度氣沖沖離家出走，到同學家暫住數天，最後，父親軟化，到同學家把我接回家。

其實，興趣轉移是一回事，成績轉差亦是事實。由於當時沉迷於課外讀物，一本接一本的買，一頁接一頁的看，對要應考的化學、物理和生物科的課本內容卻無細心研鑽，故不能通透；預科成績，雖合格但並不理想。本打算赴美修讀社會科學或哲學，卻突然接獲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來函邀請報讀法津系！若論成績，機會渺茫。但是，由於面試時教授們提出一些國際大事與我討論，而一直關注社會時事、愛分析時局的我，可以口若懸河的對答自如，因此終得成為港大法律系學生。

由1971至1974年，我修畢法學士，1974至1975年取得法學深造文憑，奠定了以律師為我的職業。但在「自由大學」修讀的幾年卻使我畢生成為一個學問的追求者，過往三十多年來，我常以「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的興趣和熱誠，每天爭取一些時間讀書，並不斷思考問題，追求答案，反省人生，我覺得我仍在「自由大學」中，尚未畢業！

5

學運開展

「自由大學」的人格鍛鍊和思想裝備，使我帶著一定的使命感進入香港大學。1971年我入大學時，察覺這所殖民地最高學府已逐漸走向開放和平民化。那是一個新舊交替，中西匯集，殖民地文化與民族主義思潮互相衝擊的一個蛻變的年代。

當時，某些宿舍如大學堂（University Hall）、利瑪竇堂（Ricci Hall）仍保留著戲弄新宿生的傳統，新丁必須探訪每一位「大仙」（舊生），備受糟躓和玩弄（如要新生買早餐和宵夜，或到操場跑圈）。更有甚者，新丁要爬在地上用鼻子打曲棍球（nose hockey），又或請得各大仙於一隻鮮雞蛋之上簽名，以換取「升仙」資格。到了「升仙」夜，新丁更要在台上演戲，大仙則可用簽了名的雞蛋來加演「擲仙記」，把雞蛋擲向新丁身上。

猶幸，我避過此類劫數，迎來的卻是另一個極端的學生會的一系列迎新活動：表面上是文明和知識型的活動，不過，全部活動都是同一個旋律，就是「認識中國，歌頌祖國」。

1972年（大學第二年），我被安排入住屬於傳統愛國左派（即國粹派）陣營的宿舍：明原堂（Old Halls），看見的迎新活動，都是歌功頌德介紹新中國。當年，港大學生會首次有「祖國遊」，一群大學生獲國內單位招待到內地參觀不同單位，如合作社、工廠等等。回港後，這群大學生便興高彩烈說箇不休，把國內的狀況形容成天上人間的美景。那時文化大革命的亂局已基本平定下來，毛澤東掌控大局之餘，並在1969年「九大」會議作了重新統戰的佈局，對內雖然實施著四人幫的暴政，對外則大展民族主義統戰的旗幟，



利用尼克遜訪華、中國加入聯合國等事實，來建立中國人的驕傲和民族認同。

經「自由大學」教育洗禮的我，深深明白獨立思考的重要性，萬勿盲從附和。未料踏進大學校園，目睹的卻是一群又一群的盲目「愛國分子」，他們不假思索，完全認同當時共產黨做的一切。他們更唸誦同一式台詞：「偉大祖國和黨領導下走的路線，是代表人類社會持續革命的成功。這是國家走向理想社會的必經階段。所以，黨領導人的思想及政策路線是絕對正確的！」

我一直認為「不研究、不思想、不批判」，便不能得出真理。思想的懶惰和人格的懦弱是造成「盲從附和」及「群眾被催眠」的主因。初生之犢的我，便向當時被稱為「國粹派」的「大仙」們發出連串提問。我指出，事實勝於雄辯，當時的國家是在管治失效、黨派惡鬥的災劫中倒退，人民活在極權專政的苦難中。文化大革命帶來災難性的破壞，導致數以萬計生靈塗炭，千年的文化傳統被摧殘踐踏；更悲涼的是教育斷層！若真心愛國，就不應該支持有關政策及路線；再者，愛國之意並不如他們腦袋中那麼狹隘，就是愛政府、愛黨、愛領袖。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所愛的是他的民族、歷史、文化及人民。我清晰地向他們表示，我熱愛國家民族，但反對政府和共產黨的專橫、反對共產黨採取的階級鬥爭路線及政策。

以上的說法，當然使國粹派的同學十分震怒。他們強烈指摘我受到國民黨以至英美帝國主義的思想所毒化，故沒有認識人民在苦難鬥爭中所建立的新中國。當我提出具體事例論證時，反對者都指我的思想和價值觀有問題，受到西方假學術所誤導和瞞騙。

當我提出人權自由是一個普世價值時，他們便封閉耳朵，認為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有不少同學更認為，在偉大的革命中，有些同胞要犧牲一些權利，甚至自由和生命，亦在所難免，最重要的是要成功的建立使中國人自豪的強大新中國。當下，我按捺不住

直斥他們，指他們不會感到人權自由的寶貴，因為他們正享受著自由和人權。其實，他們追求的是一種虛榮感，是一種只求自我感覺良好的民族尊嚴。我挑戰他們，若他們願意返回國內住三年，分享國內正被殘害的同胞們的苦杯，我一定向他們拜服。當然，三十七年後的今天，我無須向任何人就我提出的挑戰道歉，因為他們根本無勇氣犧牲個人舒適自在的生活，來承受當時「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重擔。

6

一片紅色

當年，我洞察到這群「國粹派」分子欠缺獨立的思想，以及做人的勇氣，故我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理論（escape from freedom），來給他們做人格分析。我指稱他們只是從幾千年前的封建帝制走出來，卻走向另一個專制者的懷抱罷了！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沒有勇氣接受自由，因為要接受自由，便要作出個人道德的抉擇，這便需要獨立的人格和勇氣。因此很多人寧願放棄自由，接受服從，甘願掌權者代自己作出一切決定，唯命是從。

造成明原堂左傾的原因，是當時舍內有兩位「左傾」導師：現任浸會大學校長吳清輝博士，以及陳載澧博士。再者，「國粹派」分子當時亦得到很多親中的機構支持，為首的便是新華社。另外亦要歸咎當時港英殖民地政府刻意把香港非政治化，中學歷史課程內容止於1945年，一方面避免重演國共兩黨繼續在港惡鬥，另方面亦慎防再激發另一次暴動。

我跟「國粹派」進行政治爭辯，對方以鋪天蓋地的愛國宣傳和統戰教育來回應，根本難有理性的對話。有一次，拗至面紅耳赤，甚至發生肢體推撞。不過，我漸漸發覺「國粹派」所追求的，是國家民族強大所帶來的個人榮耀感，並賴以得到個人的自豪和信心。單憑「新中國」塑造出來的理想表象，他們便挺起熾熱的愛國心，陶醉於自己偉大的祖國、偉大的政府和領袖以至英雄的人民的懷抱。但對祖國因實施封閉獨裁的政策，以及不停進行階級鬥爭的路線而引致的經濟落後，人民生活的困苦，他們毫無興趣了解，更無意批評或改革。

七十年代初於港大校內被稱為「國粹派」分子的，如今較為人熟悉的包括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為保釣運動而在釣魚台海域溺斃的陳毓祥、前立法會議員蔡素玉、現時經濟日報的三名老闆及高層（馮兆波、麥華章及石鏡泉）、現任全國政協委員鍾瑞明及其妻子（前新華社副部長）崔綺雲和任教於理工大學的陳文鴻教授等等。在商界發展的有周安橋（上市公司主席）、陸文強（銀行界）、譚兆璋（曾從事金融業，現為著名的地圖收藏家）、朱裕倫（展覽業界）、劉迺強（商人、全國政協委員）以及在教育界的關品芳和文化評論界的洪清田等，資深記者程翔也在其中。我深信不少七十年代的港大國粹派人士，在四人幫倒台或在八九民運後有深刻的反省，而他們有些人士在日後更曾與我在社運和民運上有所合作，如譚兆璋是太平山學會創辦人之一，而程翔在支持八九民運的勇氣更得到我們的尊敬。

事實上，「國粹派」在學運期間（1971至1976年）擔當相當重要的角色。當時，國內四人幫主導的極左派當權，而同學則在一片民族主義當頭的影響下，全盤接受毛式馬列主義的理論思想。但「國粹派」犯上兩個嚴重的邏輯錯誤。第一，他們認為要認識中國，必須認同自己的國家民族，因為一定要帶有民族感情來認識國家，才可了解國情及認識新生事物。他們認為國家是從一窮二白下走出來成為世界強國，階級鬥爭帶來的苦難是必須的犧牲，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中的錯誤難以避免。這種「先認同，後認知」，「認同是認知的必要條件和基礎」的取向，簡單的說，就是用感性來指揮和決定理性認知，甚至以主觀意識凌駕客觀現實。所以，國粹派很簡單地從愛國心出發，只觀看和感受到國家美好和光明的一面，完全漠視和迴避一切黑暗、不合理和不文明，如文革中違反人道的鬥爭，和那舉起三面紅旗的大躍進運動的反智和瘋狂。



第二，他們認為以民主、人權及法治的觀點來看中國，乃是以西方的資本主義世界觀及價值觀，來批判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及毛澤東思想所建立的新中國、新事物，是不科學的。這種思維方式其實極專橫和霸道，因為馬列主義數十年來正以其經濟唯物史觀來批判資本主義世界，更預言和指導工人階級組織起來，以武裝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府。就是七十年代的中國仍在支持第三世界（如越南）的無產階級革命。但當其他人用歷史事實和簡單邏輯批判毛時，卻被指稱屬不同的世界觀，故無發言權，這實是荒謬至極！

我反對共產黨專政，絕不等同我擁戴殖民地港英政府。在八十年代中英會談時，我積極反對英國政府續租香港的建議，堅持香港要回歸中國。我愛的是人民的文化、民族的中國，我有的是民族意識，但絕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在「自由大學」時期，我聽聞的盡是中國同胞的苦難，令我胸懷著祖國一片黃土地，更甚於香港這繁華都市。當時我跟在「自由大學」中認識的學者有著同一個看法：香港是借來的空間與時間，故應盡量在香港保留傳統的中華文化，並期望日後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祖國中可以重生，開花結果。我深信在人類歷史中，民主自由始終會戰勝專政極權！

哪管「國粹派」犯了多少思維和認知上的錯誤，它一直是有組織和影響力較大的一派，在院校內更滲透至大大小小的學會、組織、舍堂等。當下，我知道不應只是紙上談兵，空講理論，故在大學內跟在「自由大學」結盟的「英雄會」成員，及其他有志之士商議，組成一個「自由派」進行組織上的反擊！